

# 中文版序

《以血為墨：抗日戰爭與通俗文化，1937–1945》(*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是一本既舊又新的書。「舊」是因為英文原著由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至今已三十而立之年，而「新」是因為這本書討論的兩個主題——民族救國主義、政治宣傳文化——仍然影響著當前大陸與臺灣的政局。政治宣傳文化是一種「軟實力」，正是現時世界不同國家用來宣揚國力及攻擊敵人的重要武器。

本書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討論這個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文化界如何為了禦敵救國，運用各種通俗文化形式，包括戲劇、漫畫、報紙等來展開愛國抗敵的宣傳。第二、分析中國共產黨在其控制區(以陝西延安為中心)如何發展出一套有系統、有組織的宣傳文化形式，包括歌謠、秧歌劇、說書等來一方面抗日，另一方面打擊國民黨政權。這種策略，一直延伸至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中共善於利用通俗文藝來宣傳，是成功打敗國民黨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終在1949年建立新政權。

不過，原著討論的時限是抗日時期，至於國共內戰時期兩黨如何在宣傳戰場上交鋒，以致國民黨大敗的這段歷史，已超出英文原著的討論範圍，因此我在中譯本加了〈後記：政治宣傳文化的研究與展望〉，以作補充。我認為政治宣傳文化仍然是目前海峽兩岸對壘中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一個問題。

《以血為墨》的出版，正好是抗戰勝利80週年，可以看作是一種紀念。三十多年前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美國等地走訪四十多位投身於抗日前線的文化界人士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訪問表見附錄）。譯者麥惠嫻女士建議中譯本以《以血為墨》作書名，我覺得是切題的。「以血為墨」一詞取自作家老舍與老向在1938年出版的《抗到底》雜誌中的發刊詞（見第5章），代表了這批無分黨派、團結抗敵的文化界人士的決心，也反映了時代精神。

中譯本與英文原著在編排上有幾點不同。第一、增加了〈後記〉，補充這30年來學術界有關宣傳文化研究的新發展。第二、增加了圖片，由原先的50幅增至55幅。第三、把中文與外文的參考書目分別排印，以便讀者查核。第四、在書目和索引中增添了〈後記〉中的徵引材料，以利檢索。第五、我訪問過的45位文化界人士都已作古，所以我在書中補加了他們的卒年。中譯本的出版，也是對他們的一點紀念。

中譯本能夠順利出版，我首先要感謝麥惠嫻女士，這是她翻譯我的第三本英文著作。麥女士花了不少時間，協助我尋找書目中徵引的中文原文，恢復了當年抗日的聲音和吶喊，這是英文原著無法做到的。

我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這種毫無商業價值的學術書籍。在出版的過程中，編輯部主任葉敏磊博士一開始即熱心支持這個計劃，組稿編輯林驍女士提供專業及細心的指導，責任編輯余敏聰先生編校書稿，大力協助，在此一併衷心致謝。

最後我要感謝小女明梅，她一如既往，幫助我整理插圖及地圖，令這本書有多一點閱讀價值。

洪長泰

2025年1月24日於香港

## 致謝

這本書的出版是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指導和鼓勵。三位歷史學家的大力幫助，讓我銘感五內。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細讀原稿並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歐達偉 (R. David Arkush) 鼓勵我反覆推敲一些論點及集中分析某些主題。德里克 (Arif Dirlik) 啟發我重新思考整個研究計劃的理論基礎。他們的建議減少了這本書的錯誤，也增加一些可讀性。

我要特別感謝兩位朋友。明尼蘇達州歷史學會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的 Mark A. Green 審閱了無數次原稿，並及時提出修改意見；這本書受惠於他不斷的提點及對文章風格的提示。另一位是紐西蘭奧克蘭大學 (University of Auckland) 的 Paul Clark，他也毫不吝嗇自己的時間，不厭其煩地批改書稿，並建議許多新觀點。

不少有建設的批評與勉勵來自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何復德 (Charles W. Hayford) 和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他們閱讀過部分或全部原稿，協助我釐清不少想法，督促我修改部分細節。我在卡爾敦學院 (Carleton College) 歷史系的同事，尤其是 Robert E. Bonner、Diethelm Prowe 和 Carl D. Weiner，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史的專業知識。

我特別感謝已故的 Haldore Hanson，他提供了戰時延安及其他中國共產黨邊區的寶貴資料。也多謝朱介凡、朱寶樑、洪璇璇、余柏立、袁

一木、鄺華陽 (Robert E. Entenmann)、加賀真理子及趙啟光，他們不時提供相關的資料給我。

好幾間學術機構支持我這項研究計劃。我特別要感謝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8 年度的夏季研究資助金及 1990 年度的研究基金。1989 年我獲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資助，使我能在該年秋天前往中國進行至關重要的一系列採訪及搜集難覓的文獻。卡爾敦學院透過它的教員發展基金計劃，在過去數年給了我幾次資助，令我可以兩次赴臺灣訪問及搜尋所需的文件。

如果沒有多間圖書館及館員的大力幫助，我不可能完成這個研究項目。我十分感謝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 (1986 年我在那裏開始這項研究工作)、哈佛燕京圖書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東亞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還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

在出版方面，加州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給予最耐心的指導及對文稿的細心整理，令出版工作順利進行。我特別感謝 Sheila Levine 的鼓勵及對這本書稿的熱心支持。編輯團隊的 Laura Driussi、Amy Klatzkin 及 Monica McCormick 提供專業的意見。Ann Canright 細心為文字潤飾，增加了本書的流暢度與風采。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本書的格式與資料來源。全書用漢語拼音方法 (孫逸仙 [Sun Yat-sen] 的名字是例外，以近乎粵語的方式處理，是西方早已熟悉的做法)。至於資料來源，本書利用各類已刊登或未刊登的材料：戰時報紙雜誌、官方與非官方的小冊子、劇本、漫畫、日記、回憶錄、傳記、書信及訪問。很多當年直接參與抗戰的前線人士 (見訪問表) 給予我幫助，提供材料及建議，我銘感於心。寫當代史最難得的收穫是有機會面對面訪問當事人。書中清楚顯示，單就文本是不能解答許多問題的；在訪問這些當事人時，我獲得新的線索和啟發。本書所有闡釋和結論都是我自己的，如有疏漏，當然由我個人負責。

最後，在這裏要表達對家人的謝意。長女明梅和小兒明陽很有耐心，長期容忍我這個終日埋首書堆的父親；有他們一路陪伴在側，是我最大的欣慰和動力。再者，一如既往，我深深感激妻子麥惠嫻，她與我一起經歷生活中的苦與樂，並一直默默地鼓勵和支持我。這本書是獻給她的。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